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第 七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注 釋

- 1 “向报告人提十个問題”是列宁在1908年5—6月写的發言提綱，这个提綱是給布尔什維克领导核心的成員、“無产者报”編輯委員杜勃洛文斯基（印諾肯齐）参加波格丹諾夫在日内瓦召开的哲学报告会用的。[第3版注釋]：“向报告人提十个問題”是列宁在1908年夏天写的，第一次刊载于“列宁文集”第3卷第531—534頁。1908年6月下旬（新历），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哲学修正主义的代表之一在日内瓦宣布举行哲学講演会。根据“列宁文集”第3卷中許多同志所指出的，报告人是卢那察尔斯基。但根据主持国外情报工作的加尔亭格的情报，报告人是波格丹諾夫，这个情报是和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的回忆录符合的。在这以前，列宁关于必須和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哲学观点公开划清界限的思想完全成熟，于是他就决定利用这次會議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当时列宁本人忙于“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的准备工作，并拟赴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有关文献。因此，他就委托完全拥护列宁的立場的“無产者报”編輯委員和布尔什維克领导核心的成員杜勃洛文斯基（印諾肯齐）去發言。

在波格丹諾夫的講演会上，杜勃洛文斯基确实作了激烈的發言，当时波格丹諾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曾起来答辯。“向报告人提十个問題”是列宁給杜勃洛文斯基写的發言提綱。“十个問題”的原文是列宁亲笔写在四开紙上，杜勃洛文斯基在上面作了几个記号。

• 杜勃洛文斯基的發言标志着布尔什維克领导核心跟波格丹諾夫的哲学观点正式划清界限。

文中提到的哲学体系之基本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点，是恩格斯在其著作“費尔巴哈論”中提出的。休謨哲学是“不可知論”，这是恩格斯在他的“論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評定的。有关的两大段話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中全部引用了，見本書正文第 94—96、103—107 頁。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还發展了关于“自在之物”轉化为“为我之物”的原理。列宁在本書第 64、215—226 頁談到馬赫对舒佩及其立場的态度。

彼得楚尔特对馬赫的門徒們（特別是科內利烏斯）的評論，見本書第 229—230 頁。

关于列宁反对馬赫主义的言論，見注釋 9。

最后，至于談到列宁的也可以說是关于哲学問題的公开講演，那末，在 1909 年一年里，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保存的两个通告，曾有过两次：（1）1909 年 5 月 21 日講“宗教和工人政党”（显然，这个报告是“論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見“列宁全集”第 15 卷〕的基础）；（2）1909 年 11 月 26 日講“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論“路标”）。——（正文第 1 頁）

- 2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45 年俄文版第 42 頁。——（正文第 1 頁）
- 3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45 年俄文版第 57 頁。——（正文第 2 頁）
- 4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45 年俄文版第 34—35 頁、第 107 頁。——（正文第 2 頁）
- 5 波格丹諾夫 是馬林諾夫斯基的笔名。——（正文第 2 頁）
- 6 拉赫美托夫 是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分子奧斯卡尔·勃柳姆的笔名。——（正文第 2 頁）
- 7 見 1908 年 2 月 25 日（新历）列宁給高尔基的信（“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3 卷第 425—432 頁）。——（正文第 2 頁）
- 8 瓦連廷諾夫 是沃尔斯基的笔名。——（正文第 2 頁）
- 9 1908 年 2 月列宁在日內瓦开始写“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1908 年 5 月列宁从日內瓦到倫敦，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里專門研究一些日內瓦所沒有的文献。列宁在倫敦約一个月。

1908 年 10 月該書写成，手稿按秘密地址轉寄到莫斯科。該書由莫

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

列宁的姐姐叶利札罗娃在莫斯科担任了該書的校对工作。一份校样寄給了在国外的列宁。列宁詳細地审閱了校样，指出了他所發現的全部印錯的地方，并作了更正。列宁的一部分更正改在正文中，一部分更正列入附在第1版的重要勘誤表中。

为了使沙皇書报檢查机关沒有借口禁止該書出版，列宁不得不同意把該書的某些地方改得緩和一些。

列宁坚决主張迅速出版該書，他強調指出他对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負有写作的責任，而且負有重大的政治責任”。

該書于1909年5月出版，印数为2000册。

[第3版注釋]：列宁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哲学的，我們知道得不确切。列宁早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第一編中，就已經卓越地批判了民粹派的思想首領米海洛夫斯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理論，捍衛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辯証法。从克魯普斯卡婭的1893年至1894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列宁在防止对馬克思学說作机械的刻板的理解这一点上已經做得出类拔萃。当时在彼得堡的馬克思主义小組中非常引人注意的市場問題，在他的論述中“提得特別具体，把它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一切見解中都令人感觉到从現象的具体情况和發展来观察現象的活的馬克思主义。”（“論列宁”〔回忆录〕列宁研究院出版第1卷第5—6頁）显然，在这以前列宁徹底地研究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最重要的理論著作，其中也包括哲学著作。經常可以看到列宁引証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和“反杜林論”。但是，根据我們現在所掌握的材料可以断定，列宁在稍后一个时期才专攻哲学。

列宁在对民粹主义观点进行同样的批判时，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后的另一著作“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11—481頁）中，也談到了几个哲学問題。在第2章“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中，列宁出色地确定了社会科学中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区别，反对了司徒卢威的下述論点：“我們不能不承認，这个学說〔馬克思主义〕还没

有得到純粹哲學的論證。”(着重号是列宁加的)列宁指出,司徒卢威所說的馬克思主义的“純粹哲學的論證”指什么,是令人莫解的,因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沒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即离开其他科学而孤立存在的权利。正像后来所表明的,司徒卢威的意見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条道路就是先替馬克思主义和資產階級哲學的結合提供“論證”,而后完全公开地否認馬克思主义。

最后,在这一时期列宁的一篇論恩格斯的文章中,我們發現了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指示,这篇文章刊登在“工作者”杂志 1896 年第 1、2 两期上(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1—12 頁)。这篇文章写于 1895 年秋,它專門敘述了黑格尔的学說对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思想發展的意义以及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程。

90 年代末,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开始認真地研究哲学問題。

克魯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晚上讀哲学著作——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伊里奇在吉斯遇到林格尼克的时候和他談論康德(前引回忆录第 25、27 頁)。列宁之所以在这个时期研究哲学,这首先取决于哲学爭論和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問題在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出現之初所占的地位。大家知道,伯恩施坦的基本理論原理之一,就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方法当作黑格尔經院哲学的殘余加以否定。伯恩施坦、他的哲学导师康拉德·施米特以及俄国修正主义者,首先是“合法馬克思主义”营垒中的修正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力圖在哲学領域中把他們曲解了的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和經濟理論同康德主义联結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必須起来保衛馬克思主义,并且在这方面把自己武装起来。列宁在 1898 年 9 月 2 日致波特列索夫的信中指出了 H. Г. (即日特洛夫斯基)發表在“俄国财富”杂志(1898 年第 6、7 两期)上的反对唯物主义和辯證邏輯的言論,并且写道,“我很奇怪,为什么《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唯物主义史論丛”]的作者〔普列汉諾夫〕过去既不在俄国著作中反对新康德主义,而現在

又不坚决反对它，却讓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去爭論这种哲学的枝节問題，似乎这种哲学已成为俄国学生〔即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一部分了”。列宁在俄国最先完全不受普列汉諾夫的著作的約束而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系統地叙述和發展了辯証唯物主义。

当时普列汉諾夫也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觀唯心主义，批判了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的康德主义和客觀主义。但是，列宁的批判無論就深度或政治上的尖銳程度來說，都大大地超过普列汉諾夫的那种学院主义的抽象的批判。列宁甚至在自己最早期的著作中徹底發揮了理論的党性，特別是哲学的党性問題。

列宁在1899年4月27日的信中又指出，他觉得馬克思主义中的那股“新的批判風气”，即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迷恋的那股批判風气，“極為可疑”（“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18頁）。最后，列宁在1899年6月27日致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写道：“对于俄国学生們的那些‘惊人發現’以及他們的新康德主义，我愈来愈感到憤怒……我非常滿意地一再閱讀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讀了这位作者發表在《Neue Zeit》（“新时代”。——譯者注）上的那些反对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文章（1898—1899年“新时代”第5期，以后各期沒有見到），讀了我們的康德主义者（彼·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稱贊的Stammeler（《Wirtschaft und Recht》）（什塔姆列尔〔“經濟和法”〕。——譯者注），我坚决站在一元論者这边。什塔姆列尔特別使我憤怒，在他那里我根本看不到絲毫新穎的有內容的东西……十足的 *erkenntnisstheoretische Scholastik*！（認識論的經院哲学！——譯者注）这是最平庸的最坏的法学家的拙劣的‘定义’以及由此得出的同样拙劣的‘結論’。在讀了什塔姆列尔的著作以后，我讀了‘新語’杂志上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的文章，發現的确須要認真地对付新康德主义。我已經忍不住了，所以对新康德主义發表了意見，进行了抨击，以此回击司徒卢威（針對他發表在“科学評論”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和回击布尔加柯夫。我說‘忍不住了’，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沒有多多學習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題目写文章。現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維修研

究起，然後準備轉到康德。”（“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24—26頁）

的確，1899年列寧在“再論實現論問題”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這兩篇文章中，對康德主義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列寧在一個地方給第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注釋：“順便談一談司徒盧威所如此迷戀的這個（未來的）‘批判’。當然，任何思想健全的人都不會反對一般的批判。但是很明顯，司徒盧威卻重複著自己的一個心愛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學’豐富馬克思主義。自然，我既沒有願望，也沒有可能在這裡談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內容的問題，因此只能發表下述的意見。馬克思的那些號召‘回到康德那裡去’的學生，至今沒有提供任何東西來證明這種轉變的必要性，也沒有提供任何東西來清楚地表明：由於用新康德主義豐富馬克思的理論，因而使馬克思的理論得到好處。他們甚至沒有完成首先落在他們肩上的任務，即詳細地分析和駁斥恩格斯對新康德主義的否定的評價。相反地，那些沒有回到康德那裡去，而是回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唯物主義和辯證唯心主義那裡去的學生，卻對辯證唯物主義作了極其完美的有價值的闡述，指出了辯證唯物主義是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整個最新發展的合理的必然的產物。對我來說，只援引別爾托夫先生的著名的俄文著作（指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史觀的發展問題”。——譯者注）和德文著作《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Stuttgart, 1896）就夠了。”（“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65頁）

列寧在“農業中的資本主義”這篇反對布爾加柯夫的文章中，在提到布爾加柯夫所謂他的世界觀和考茨基的世界觀相同的說法時指出：“講到哲學世界觀，我們不知道布爾加柯夫先生的話對不對。考茨基似乎不是布爾加柯夫先生那樣的批判哲學的擁護者。”（“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36頁）

最後，在上面引証過的1899年6月27日致波特列索夫的那封信中，列寧談到刊載在“開端”雜誌第5期上的一篇評論波格丹諾夫的著作“自然史觀的基本要素”（1899年聖彼得堡版）的匿名文章。因為評論者對這本書作了否定的批評，說它和康德主義背道而馳，列寧非常注意

這本書，懷疑它的作者（以及在它以前出版的“經濟科學簡明教程”的作者）是普列漢諾夫。列寧對於這本書發生興趣，這足以說明這一時期列寧的思想傾向。顯然，當時列寧為了和修正主義者的“批判主義”作鬥爭，想把自己徹底武裝起來。必須指出，實際上波格丹諾夫的這部著作，正像列寧在後來知道了它的內容以後所指出的，的確是接近唯物主義的，儘管它沒有擺脫在奧斯特瓦爾德的唯能論哲學的影響下所犯的錯誤。

在 1898 年至 1899 年這一時期還有列寧和林格尼克關於哲學問題的通信。可惜，由於林格尼克在西伯利亞流放期滿之後過着流浪的生活，這些書信被遺失了。不過，根據他的回憶，列寧在這些信內分析批判休謨和康德的哲學，捍衛辯證唯物主義（“列寧文集”俄文版第 1 卷第 194—195 頁）。勒柏辛斯基在自己的回憶錄（“變遷”）中補充說，列寧致林格尼克的信有時候是完整的長篇哲學論文。

最後，在這一時期寫的還有：（一）列寧在 1899 年末寫的一篇對考茨基的著作“反伯恩施坦論”的評論，這篇評論載於“列寧文集”第 7 卷，列寧在這裡滿意地指出考茨基捍衛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二）列寧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中對新康德主義的批判（“列寧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第 559—581 頁），這篇文章是列寧為了回答斯克沃爾佐夫對他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批評而寫的。

這就是列寧從事哲學研究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是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其中也包括反對披着康德主義外衣的哲學修正主義的鬥爭，緊密地聯繫着的。

列寧從事哲學研究的第二階段是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發生的哲學動搖的第二階段聯繫着的。這一階段的哲學動搖開始於 1903 年至 1904 年，而在 1905 年的革命失敗之後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在這一階段，哲學修正主義的最著名的代表是波格丹諾夫。在第一階段，修正主義的思想鼓舞者是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這一口号的新康德主義，而在第二階段，哲學修正主義首先是和馬赫、阿芬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結合在一起的。

列寧在 1908 年 2 月 25 日致高爾基的信中這樣敘述了他和波格丹諾夫的關係：

“自从我在西伯利亚仔細研究了波格丹諾夫的唯能論著作‘自然史觀’以后，我就注意他的哲学著作了。对波格丹諾夫來說，这种观点只是他向其他哲学观点的过渡。我同他認識是在1904年，当时我們就立刻互相贈送了自己的著作；我送他一本‘进一步，退两步’，他送我一本他当时写的哲学著作。我并且很快（1904年春天或夏初）就从日內瓦写信到巴黎告訴他，他的著作使我更不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更相信普列汉諾夫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同普列汉諾夫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們曾几次談到波格丹諾夫。普列汉諾夫向我解釋波格丹諾夫观点的錯誤，但他認為这种偏差决沒有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清楚地記得，1903年夏天我和普列汉諾夫以‘曙光’杂志編輯部的名义同‘实在論世界觀論丛’編輯部的代表在日內瓦談过話，双方同意合作，我負責談土地問題，普列汉諾夫負責在哲学上批判馬赫。普列汉諾夫提出把批判馬赫作为合作的条件，‘論丛’編輯部的代表完全接受了这个条件。当时普列汉諾夫把波格丹諾夫看作是反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然而是一个由于追随奥斯特瓦尔德和馬赫而犯了錯誤的同盟者。

“1904年夏天和秋天，我們同波格丹諾夫等几个布尔什維克的意見完全一致，我們訂立了默契，大家不談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它使我們有可能在革命中共同貫徹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布尔什維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我深信不疑地認為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25—426頁）

这个联盟决不是意味着不批判波格丹諾夫的錯誤。相反地，我們知道，还在“經驗一元論”第1卷（1904年波格丹諾夫将此書贈送給列宁）出版之前的一年半至二年期間，列宁曾專門要求普列汉諾夫，后来又要求阿克雪里罗得（即奥尔托多克斯，她在“曙光”杂志上写过哲学方面的文章）去批判波格丹諾夫的錯誤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资产阶级“批判”意向的新变种（參看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1904年写的文章“修正主义的新变种”，載于“哲学概論”1906年版第171頁。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參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261、269、271、273

頁)。所以,当后来普列汉諾夫为了狹隘的宗派目的而責难布尔什維克是馬赫主义者的时候,列宁有充分根据去援引自己不止一次地發表过的反对波格丹諾夫最初背弃唯物主义的那些言論。在“普列汉諾夫和新火星报”(1905年9月,載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361頁)一文的綱要中,有“吹毛求疵的指摘”一項,其中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無中生有地指摘布尔什維克对哲学不关心,并且用上述奥尔托多克斯的申述来反对他。但是,那时候哲学問題还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我們發現列宁只是在“怎么办?”(在“恩格斯論理論斗争的意义”那一节)和“进一步,退两步”中順便提到过哲学的作用。在“进一步,退两步”的“稍微談談辯証法”那一节中,列宁指出,不仅燕麦苗是“按黑格尔的規律”,即按否定的否定規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間的斗争也是“按黑格尔的規律”进行的。

革命以后,哲学問題重新被提到重要地位。列宁在“我們的取消派”(發表在“思想”杂志1911年第2、3两期上)一文中,概括地描述了1908—1910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哲学爭論,而且特別說明了哲学爭論和馬克思主义的命运之間的“真正的現实的联系”。列宁指出,“(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錯誤的、危險的、反动的,对这些問題的爭論总是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別’有‘真正的現实的联系’,不然这个派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不成其为派別了。只有主張改良主义或無政府主义的那些鼠目寸光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認这种联系的‘现实性’。(2)既然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內容,那末在俄国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使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更加突出,就沒有什么奇怪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別突出,在1848年,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別突出,在50和60年代,馬克思的經济学說特別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別突出的是馬克思的經济学說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說,有时可以忽視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說,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願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3)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訓的时期,对于每个

生气蓬勃的派別說來，是把包括哲學問題在內的基本理論問題放在一個首要地位的時期，並不是偶然的。(4) 在俄國先進的思想流派中，沒有像法國那種同18世紀的百科全書派有聯系的或者德國那種同從康德到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古典哲學有聯系的偉大的哲學傳統。因此，正是對俄國的先進階級來說，這種哲學‘整頓’是不可缺少的，至於這種‘整頓’珊珊來遲，在這個先進階級完全成熟到在最近的偉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獨立的历史作用以後才開始進行，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5) 世界其他國家早就準備好進行這種哲學‘整頓’，因為例如新物理學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有待辯證唯物主義去‘處理’。在這方面，‘我們的’（波特列索夫的說法）哲學爭論就不只具有一定的即俄國的意义。歐洲已為‘更新’哲學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後的俄國在1908—1910年這個被迫沉寂的時期，特別‘渴望’求助於這種材料……”

所以，列寧繼續寫道：“我們的一切反動派，特別是自由派的（路標派的、立憲民主黨的）反動派，‘求助於’宗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馬赫主義這個變相的唯心主義客觀上就是反動派的武器，反動派的宣傳工具。因此，在1908—1910年這個历史時期，在我們看到‘上面’不僅有十月黨人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拜神杜馬’，而且還有拜神的立憲民主黨人、拜神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時期，‘下面’反對馬赫主義的鬥爭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卷第58—60頁）

在上面引用過的那封致高爾基的信中，緊跟着我們引証的那段關於1905年革命前列寧和波格丹諾夫的相互關係的敘述之後，列寧寫道：“在革命火熱的時候很少研究哲學。1906年初波格丹諾夫在獄中又寫了一部著作，大概是‘經驗一元論’第3卷。1906年夏天，他送了一本給我，我便坐下來仔細讀它。我讀完之後非常生氣，因為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極端錯誤的道路，非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我那時就向他‘表白愛情’，給他寫了一封關於哲學問題的長達三個筆記本的信。我在信中明白地告訴他，在哲學方面我當然是一個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正是他那些明白易懂、寫得很出色的著作使我完全相信他根本錯了，而普列漢諾夫是正確的。這些筆記本我曾給某些朋友（其中包括

卢那察尔斯基)看过,本来想用‘一个普通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見解’这个标题發表出来,但是沒有实现。現在很后悔当初沒有立即把它發表。前几天我写信到彼得堡請求把这些筆記本找出来寄給我。

“現在,‘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已經出版。除了苏沃洛夫的那篇文章(我正在看)之外,其余的我都看了,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簡直要發瘋。不,这不是馬克思主义!我們的經驗批判主义者、經驗一元論者和經驗符号論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們劝讀者相信‘信仰’外部世界的眞实性就是‘神秘主义’(巴札罗夫),他們把唯物主义同康德主义混淆得不成样子(巴札罗夫和波格丹諾夫),他們宣傳不可知論的变种(經驗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經驗一元論),教給工人‘宗教無神論’和‘崇拜’人类最高潜在力(卢那察尔斯基),宣布恩格斯的辯証法學說为神秘主义(別尔曼),从法国某些‘实証論者’(主張“符号認識論”的該死的不可知論者或形而上学者)的臭水沟里汲取东西(尤什凱維奇)!不,这太不像話了。”(“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26—429頁)

列宁的那几本称为“表白爱情”的筆記本,我們也沒有找到。不过,其中的观点显然是后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所發揮的那些思想的雛形。

1907年到1908年,哲学問題上的斗争愈来愈尖銳。当时,波格丹諾夫是布尔什維克領導核心的成員和“無产者报”編輯部的委員。列宁的任务首先是和波格丹諾夫的哲学观点划清界限;正如列宁在1908年3月24日致高尔基的信中所写的,“把这一切爭論和派別分开”(“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6頁),这样讀者就沒有理由像普列汉諾夫从他的孟什維克派的观点出發所作的那样,把布尔什維主义和波格丹諾夫的馬赫主义联在一起。但是,列宁認為布尔什維克內部在哲学問題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自己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上的任务只在于,不使斗争引起布尔什維克派分裂。所以,当《Neue Zeit》(“新时代”杂志1908年第20期2月14日出版)上發表了波格丹諾夫的“馬赫和革命”一文的譯文和譯者序(其中談到,普列汉諾夫和波

格丹諾夫的意見分歧，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有可能成为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这两派的意見分歧)的时候，“無产者报”編輯部根据列宁的坚决要求發表了評論文章。文章中指出，两种哲学思潮的拥护者在两个派別中都有，因此，任何想把这些意見分歧說成是两个派別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企圖，都是根本錯誤的（“無产者报”1909年2月26日第21号）。在“新时代”杂志1908年3月20日第25期第898頁上也發表了一篇相应的文章，題为“馬赫在俄国”。

当时斗争展开了。列宁虽然暂时主張布尔什維克派在这一斗争中保持“中立”，但列宁自己完全不打算保持中立。恰恰相反。布尔什維克派（包括“無产者报”）保持“中立”，在特殊的刊物上，而不在布尔什維克的主要刊物上进行哲学斗争，就是为了防止布尔什維克派在政治上無根据的分裂，并且首先証明布尔什維主义和馬赫主义沒有任何联系。高尔基曾認為，如果布尔什維克內部在哲学上进行爭論，孟什維克就会从中漁利。列宁在1908年3月24日的信中对高尔基的这种看法提出批評說：相反地，如果布尔什維克派不把自己跟三个布尔什維克（波格丹諾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哲学分清界限，孟什維克才会从中漁利。列宁写道：如果不这样做，那末孟什維克就会徹底获得胜利。“如果哲学爭論在派別之外进行，那末孟什維克就会被完全牽到政治上来，在这里他們只有死路一条。”（“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7頁）

哲学上的意見分歧所引起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同一封信中这样向高尔基指出：“当然，您必須明了，也应当明了：一个党员一旦認識到某种学說是極端錯誤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說。如果我不是絕對相信（我愈是閱讀巴札罗夫、波格丹諾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們的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謬、有害、庸俗、說教的作品，我也不会来爭論的。普列汉諾夫反对他們實質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懶于具体地、細致地、簡明地說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来吓唬这些人。我無論如何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說出自己的反对意見。

“亲爱的阿·馬·，这里有什么‘和解’可言呢？別那么想了，提和解是可笑的。斗争绝对不可避免。党员不应力图掩盖、拖延或迴避斗争，而应当力争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损害。您应当关心这个问题，十分之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会在这方面帮助您，并对您表示深深的感谢。

“应当怎样做呢？‘中立’么？不，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可能有中立，也不会有中立。如果可以谈中立，那也只是指这样一种特定的意思，即必须把这一切争论和派别分开。”（“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5—396页）

可见，列宁的计策是很清楚的：把布尔什维克派和三个布尔什维克-馬赫主义者的哲学分清界限，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同孟什维克进行政治斗争，可以避免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可以在哲学上和哲学修正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由于修正主义者在西欧得到支持，因而列宁的处境更加困难。列宁在1908年2月13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证明，考茨基主办的最稳健高明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而在最近竟无条件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2页）。哲学唯物主义在西欧处处遭到蔑视。两个派别中有一股巨大的写作力量站在馬赫主义者那边，此外紧靠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他们来“推翻”唯物主义的是切尔诺夫。十分广泛的反唯物主义的统一战线形成了。因此列宁更坚决地起来捍卫唯物主义。

斗争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信（1908年4月）中抱怨地说：“我现在整天阅读该死的馬赫主义者的文章，而给报纸的文章却写得非常仓促。”（“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8页）但是，这个斗争是必要的，列宁非常慎重地准备了这个斗争。

列宁在为“卡尔·馬克思”文集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中开始了战斗，“卡尔·馬克思”文集是一群布尔什维克编辑的，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给自己的文章加上了这样一个注释：“见波

格丹諾夫、巴札羅夫等人合著的‘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這裡不是分析這本書的地方，我現在只聲明一點：在最近的將來，我要寫幾篇論文或專門寫一本小冊子來說明，本文中關於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所說的一切，實質上也適用於這些‘新的’新休謨派和新貝克萊派修正主義者。”

列寧還在正文中寫道：“在哲學方面，修正主義跟在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的屁股後面跑。教授們要‘回到康德那裡去’，修正主義就跟在新康德主義者後面蹣跚而行；教授們重複僧侶們已經說過一千遍的、反對哲學唯物主義的濫調，修正主義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囔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冊逐字逐句地嘟囔着），說唯物主義早已被‘駁倒’了。教授們蔑視黑格爾，把黑格爾當作一條‘死狗’來看，而自己却在宣揚比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還要淺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義，同時帶着蔑視的意思對辯證法聳聳肩，修正主義者就跟着他們爬到從哲學上把科學庸俗化的泥潭裡面去，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靜的）‘進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辯證法。教授們拿他們那些唯心主義的和‘批判的’體系去適應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哲學’（即神學），以酬答官家給他們的薪俸，修正主義者就附和他們，努力把宗教變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對現代國家而言而是對先進階級的政黨而言的‘私人的事情’。

“對馬克思學說的這種‘修改’的真正的階級意義是什麼，這無須加以說明，因為這是不說自明的。我們僅僅指出，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普列漢諾夫是從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批判過修正主義者在這裡大講特講的庸俗不堪的濫調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點所以必須堅決地着重指出，是因為現在有些人極其錯誤地企圖以批判普列漢諾夫在策略方面的機會主義為幌子來偷運陳腐反動的哲學垃圾。”（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卷第15—16頁）

因此，列寧強調了普列漢諾夫在維護辯證唯物主義的鬥爭中，特別是在和馬赫主義的鬥爭中所作出的實際的功績。然而列寧認為普列漢諾夫的批判還不夠，指出必須更徹底地批判馬赫主義，揭露它的階級根源和認識論根源。

列宁在發表这种言論的同时，繼續写一本反对經驗批判主义的著作。为了对这本著作进行最后的加工，列宁特地到倫敦，在这里他可以利用大英博物館的丰富的藏書。1908年秋，著作完成了，1909年春出版。

当时，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同大多数布尔什維克之間除了在哲学領域中有意見分歧，他們之間的政治性質的意見分歧也尖銳化了。大多数馬赫主义者和造神派（以卢那察尔斯基为首）拥护“抵制主义”、“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召回第三屆国家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1909年初，“無产者报”开始公开地和馬赫主义哲学斗争，在1909年2月25日（旧历12日）第42号上刊登了加米涅夫的一篇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题为“路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加米涅夫尖銳地批評了卢那察尔斯基企圖通过造神說的宣傳“使社会主义具有更适合于非無产者階層的形式”。加米涅夫在文章中宣称：“适应半农民的宗教心理并以为这样可以促进‘革命的合作’的那种社会主义，和那种‘不去惊动自由資产階級’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价值相等的东西。”

波格丹諾夫支持卢那察尔斯基，他对于刊登这篇文章發表了正式的抗議。結果“無产者报”編輯部發生了激烈的組織上的冲突，后来，徹底和波格丹諾夫集团决裂了。

当时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为了巩固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培养宣傳干部，在高尔基的协助下，在喀普里島上替从俄国召来的一群工人組織了一个“学校”。列宁拒絕在这个学校中工作，即拒絕在波格丹諾夫信徒的宗派組織中工作。1909年6月“布尔什維克領導核心”召开了會議（所謂“無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在會議上徹底和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和其他馬赫主义者、召回派和造神派决裂了。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中間的造神派傾向”問題，決議写道：“目前在社会运动低落的气氛中，反革命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宗教情緒的高漲，使得这类問題具有了重大的社会意义；由于宗教情緒的这种高漲，現在个别社会民主党人企圖把信教和造神說的宣傳同社会民主主义联系起

来，甚至企圖使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無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有鑒于此，特声明如下：在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文章中所特別明显地鼓吹的这种思潮是完全背离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就这种說教的實質而决不是就一个名詞來說，这个思潮損害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工人群众方面的工作；布尔什維克派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無共同之点。

“其次，‘無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肯定，这一思潮是小資产階級傾向和無产階級的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形式，既然这个思潮轉到討論政治問題（例如，載于“文学的崩潰”中的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的），既然它以前者代替了后者，‘無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認為，在‘無产者报’第42号上刊登‘路不同’一文，这是正确的，并建議編輯部和过去一样，同諸如此类的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揭露它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性質。”

关于波格丹諾夫提出的抗議，曾通过以下的決議：“馬克西莫夫同志〔波格丹諾夫〕向‘無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提出抗議，反对‘無产者报’編輯部刊登‘路不同’这篇文章，关于这个包含着分裂威胁的抗議，‘無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認為有必要作如下的声明：（1）馬克西莫夫以破坏編輯部关于不在秘密刊物上刊登哲学文章的决定为借口，是毫無根据的，因为和各式各样的宗教意識以及来自任何地方的宗教情緒进行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是布尔什維克派领导机关当前的任务之一，‘無产者报’無論如何不能不参加这样的斗争；（2）应当看出，这样的抗議是企圖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替造神說的宣傳打掩护，并阻撓‘無产者报’去完成自己的一个任务。”

脫離了布尔什維主义的波格丹諾夫及其信徒們，以特殊的派別出現，他們擁有自己的刊物“前进报”，并且在1909年出版了自己的新的公开的文集“集体主义哲学概論”。文集的內容是：維尔涅尔（波格丹諾夫）的“科学和哲学”，波格丹諾夫的“現代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巴札罗夫的“集体經驗的材料及其組織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的“小市民和个人主义”，高尔基的“个性的破坏”。